

# 生年

# 1966

胡廷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生逢

1966

胡廷楣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逢 1966/胡廷楣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6

ISBN 7-5321-2833-4

I. 生…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228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周艳梅

插图:张安朴

### 生逢 1966

胡廷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e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36,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册

ISBN 7-5321-2833-4/I·2186 定价:24.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引 子

那条老旧弄堂名叫大同坊，位置在上海淮海路最繁华的一段，重庆路和成都路的中间，弄堂口正对着有名的华亭伊思丹。

当年的大同坊用上海话说是“蛮正气的”，一条大弄堂，没有转弯，和两条平行的马路成90度的交角。像上下两个“丰”字相叠，左右相对，各有六条支弄。

石库门实在是一种带有很浓重的过渡态的东西，似乎是上海从农村变成城市和从土变洋的标志。也是建筑者试图将自己乡下观念带进狭窄的上海的挣扎。大同坊正是这种变动的遗迹。弄堂前身是一个叫杨家宅的村子，后来一条没有头的河浜被填死了，弄堂就是在河上建起来的。剩下一截河浜也造了一条弄堂，就叫杨家弄，在长乐路的对面。大同坊和杨家弄里都有若干口井，井水经常有点闷臭味，只能用来大扫除。老人就说，那是河浜里的水一直没有淘净的缘故。

从弄堂的许多细节，能见到营造商和大房东的匆忙。你可以推论，老板一旦占下了地皮，就要立即生钱。楼梯是史无前例的窄，不能并肩走两个人，而且非常的陡。本小说的主角陈瑞平后来登泰山的时候，到了险峻的十八盘，只觉得和上海自己家里的楼梯一样罢了。这条弄堂简洁过了头，除了门楣需要符合石库门的精制，门框用

花岗岩的条石制成,其余一切可以偷工减料的地方,就全部省简。没有厢房,只有前间和亭子间,天井也比别的弄堂要小得多。弄堂里没有一棵树,阳台上可怜巴巴的盆花,仿佛是一个一个囚犯各自仰望着天空。另外的绿色是在水泥地的裂缝中,有那么一些黄金瓜子或者是西瓜子落到了那里,就不顾一切生长了起来。它们最多能长到第三片叶子,一定会被烈日暴晒而干死。

弄堂的生气勃勃不在房子,而在人。上个世纪20年代之后,石库门就逐渐覆盖了大半个上海。那仿佛是一辆快速的列车,所有的人全是匆匆过客。和乡下不一样,他们居住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亲情,而是因为生活,因为口袋里叮当能响的银元的数量。弄堂刚刚建成的时候,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洋行职员,也有商人,也有从乡下搬进城里的有点小资本的,他们是没有定型的砂子,随时等待水和泥来塑造,石库门就是他们的过渡形态,他们似乎是和石库门匹配的人物,等待发达了就搬出去,住周围更好一点的大楼公寓,例如对过的永业大楼、左右隔壁的飞龙大楼和康绥公寓。他们在石库门如鱼得水般的欣欣然。还有一个对照物,就是棚户区。那里的贫困是他们不敢懈怠的警告。

弄堂在解放后渐渐变成了女权主义的世界。大同坊人越住越多,房间越住越小,老虎窗越开越多,出现了“阳台搭建”、“灶间搭建”这类建筑新名词,邻居也越做越长。妇女走出家门就成为弄堂的代表,整条弄堂里,见面的称呼全是“大姐”。从里委会的主任开始,一直到委员,到小组长,最后是普通家庭妇女,一律张大姐李大姐地称呼,女佣人也叫劳动大姐。石库门首先实行了女子平等。女人们天然的优点缺点,在这样适宜的土壤着床,满天飞舞。石库门老一代的男人本不在弄堂里摆魁劲。后弄堂新搬进来的那些解决住房困难的男人,不免格局渺小。那些双手戴着半截手指的手套,两臂套着沾有墨水的袖套的小业主小职员和中小学教师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他们驼着背,在上班的时候随时准备聆听经理或者科长或者校长的使唤。即使走进弄堂,也是将头缩到肩胛里面的。亭子间和灶披间

里还住着那些做几角钱小生意的人，他们统统默默无闻。男人被女人使唤着到老虎灶泡开水，被女人从还魂觉中唤醒，睡眼惺忪穿着皮拖鞋悠悠荡荡去倒垃圾畚箕。男人天生的两个毛病贪婪和懒惰，贪婪在这里无法施展，懒惰却因为石库门女人的能干而越发成为不治之症。当时《参考消息》要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能享受，男人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有觉悟的人们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出产的影片全部是黄色的颓废的腐朽的和反动的，所以人们不知道格里高利·派克、马龙·白兰度和埃尔·帕西诺年轻时代是怎样的面容。足球还没有电视作传媒红不起来，看不到贝利，马拉多纳刚刚穿开裆裤，贝克汉姆还没有出生。谈论国家大事很危险，男人在弄堂里是最无聊的。麻将的名声一直不好，当时已经被禁止。打康乐球虽然时兴，却是少年的专利。他们比较正经的活动是站在弄堂里的报栏前看报，在路灯下谈山海经，下棋，打扑克牌。中国最好的棋手和桥牌选手出现在上海完全因为石库门的传统。

那些老住户，一再唉唉叹息弄堂的堕落。而女人到哪里都要生活，她们认了劳碌命，便频繁奔出走进，使得石库门就很像一个嗡嗡的蜂巢。大同坊和淮海路金色的优雅浪漫分开来了。

靠近淮海中路的前面三排弄堂里，全部有抽水马桶。后面数条小弄堂，就简陋得多了，家庭主妇要赶早起来倒马桶的。陈瑞平的爸爸刚刚住到这条弄堂时，第一个早晨就被暴风雨一样的声音吵醒了。于是，这个乡下进城的小知识分子就有诗赞曰：

城市无鸡鸣，  
有车当弄候，  
车夫一声唤，  
户户笊声和。

其中“笊声”是用毛竹批开做成的洗刷马桶的工具发出的声音，上海人领教毛蚶的厉害，整个城市传染肝炎陷入恐慌是在后来。当

时带血的毛蚶是上海人桌上不要命的海鲜，消耗量很大。其明证就是当年的职业洗刷妇女无一例外在马桶里面装入很多坚硬发脆的毛蚶残骸，这样在洗刷木制马桶时声音铿锵。马桶是一个质量良好的音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敲击或者摩擦，音阶音域各各不同，况且每个马桶中的水还有清浊深浅，毛蚶壳也多少有别，马桶木板质地有高下，马桶箍得有松紧，所以每个马桶全都有个性。更加上洗刷马桶的女子也有个性，在倒马桶的男声领唱之下，东西三排支弄堂总共七八十只马桶一时齐鸣，气势如贝多芬交响曲一样雄伟。可惜倒马桶毕竟在艺术中没有地位，前弄堂的小康和后弄堂的寒碜就此分开。而前弄堂看后弄堂的傲慢的眼睛，和后弄堂看前弄堂的羡慕的神色，自然将整条弄堂融会贯通。

整条弄堂在5点就醒来了。接下来还要听到淮海路上2路和6路有轨电车的叮当声，这声音就像是婉曼的晨曲，刚好是后弄堂刷马桶野蛮粗犷的对照。

男人多少有一点虚荣，在给亲友的信上，赫然写上“淮海中路×××弄”，表示自己住在上海“上只角”中的最好的地方。淮海路从霞飞路开始就一直浪漫。大同坊的男人在说霞飞路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霞字拖长了发成“亚”的音。这样当然更能使人浮想联翩。不过，今天附庸风雅的“新新”一派，经常误会了历史，以为“霞飞”两字会有“落霞和孤鹜齐飞”一类的联想。后弄堂男人们会一针见血地点穿，这是一个法国人的名字。他们不提淮海路还有两个不被人注意的路名“宝昌路”和“林森路”，他们根子里有一点炫耀。他们宁愿不把淮海路上的行道树准确地说成是悬铃木，而诗意地说成“法国梧桐”。悬铃木树冠庞然，根系却很浅，树上没有除了蛀虫以外的生物，有自知之明的知了不敢在喧嚣的市声里没完没了地聒噪，鸟雀远远飞走了，金梧虫天牛和蝴蝶也远远逃遁。树们只在春天结一些茸球一样的果实，然后纷纷扬扬落在地上。上海一旦起了台风，淮海路的树经常被吹倒，百千翡翠零落散在地上，像是美女玉体横陈。面对这样的树，有情调的人才会有浪漫，偏偏后弄堂男人过于现实。他们

也逛淮海路，只是为了道听途说，小心搜罗，以便今后当成谈资。霞飞路不是法国的香榭丽舍，大多数店铺是白俄开的。蕾纳生餐厅是希腊的，宝德食品是英国的，安利牛肉庄是德国的。红房子原来叫罗威饭店，其实是一家意大利餐馆。这样的店铺如今已经全部雨打风吹去，所以他们才可以在“下只角”出来的人面前夸夸其谈。他们其实吃的也不过是大饼油条和泡饭。

女人比男人明白，所谓浪漫可以炫耀，但是不能当作依靠。淮海路就像是出客衣裳的毛料面子。北面的长乐路才是和他们生死与共密不可分贴心贴肉的破旧夹里，正如风水学都将“后院”安排在非常妥帖的北方。从大弄堂的北门出去，有永远排着队的米店，有散发着酸味、咸味和劣质黄酒味的酱油店，有两手笼在袖管里、戴罗松帽的老头守着的烟纸店，有卖盐金花菜和糖萝卜丝的小玻璃车，有“长一”“长二”“长三”三所小学，还有两所中学，有露天的大饼油条摊，有用油毛毡挡点风雨的包饭作，面店、馄饨店。汤团店里有一面镜子，上面用油漆画着一个倒提大刀关羽的关云长，瑞平小时候照这面镜子，经常和青龙偃月刀、赤兔马的马蹄同处一个角落。因为喜欢这样照镜子，所以瑞平吃汤团比馄饨要多好几回。有老虎灶、裁缝铺，有剃头店，有小皮匠、洋铁匠，有爆炒米花的，有一分钱看两本的小人书摊，也有当店和小便池。

女性的比赛在倒马桶之后继续进行，每户人家每天至少要因为买菜穿过后弄堂一次。整条弄堂被倒马桶的狂风暴雨惊醒之后，不断有人迈着急促的步子摸黑通过长乐路到巨鹿路去。那里曾经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菜场，一个接着一个摊子连起来有三里远。她们挎着篮子一律如竞走一样带着小跑。前弄堂的是劳动大姐在跑，后弄堂的是“李大姐”、“王大姐”在跑，边跑还边寻找熟悉的“搭子”。竞争是石库门女人的本能，刚刚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育，她们知道领先一步轧入队伍的重要性。物质供应是有限的，可能一条带鱼或者一片“热气”精肉就因为跑得慢成为人家篮子里的东西。更何况上海人有的是“轧”的资历，他们曾经在日本人手里轧过六谷粉洋糍米，



在国民党手里轧过黄金银圆，上海人是最善于人轧人的。由于当时的人缺乏雅兴，没有人想到要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同坊争得“家庭妇女早晨菜场速度和人数世界之最”就成为明日黄花。在油腻腻的、永远是昏黄的、电压不足的电灯下，她们四处安点，无私无畏地杀人密不透风的人丛，一只手高高举着自己的篮子，另一只手紧紧捏着自己那一两元钱和鱼票肉票蛋票，对着摊头上的人高喊：“挨到我了，伊是插进来的！”她们义正辞严的举报往往并无实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宗。在当时，能够和一个斩肉的眉来眼去地打个招呼，其公关能力相当于今天认识美领馆签证的老外。

当她们拎着沉甸甸或者空落落的篮子走出菜场的时候，才用余光一扫那些地摊，摊主都是无师自通的广告高手。从很多人脚上剔下来的鸡眼老茧集成一大堆，被摊主当作宝贝，证明“鸡眼膏”的效力，还有几个死老鼠被制成标本，成为鼠药厉害的模式。数个搪瓷面盆全是百孔千疮，当场补洞可以见证“焊锡”的牢固。这样的货色常常经过家庭妇女口耳衔接的传销，与一尺一卖的宽紧带、零头布和零星的钮扣一起流入石库门弄堂。当然，那里还有很多要饭的人，纷纷用自己的可怕的病态显示慈善的必要。瑞平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个坐在路边的中年男人，他将自己的一个裤脚管捋起，他的小腿肿得和庙里的廊柱一样粗。一条弄堂全在传说他的“大脚疯”。妈妈走过这里，掩住瑞平的眼睛，在他面前的地上放下一角钱。向男人施舍的还是女人。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最后那条小弄堂里。向左拐第四个门，90号住过陈瑞平的一家。

陈瑞平的爸爸当年是一位公私合营的私方厂长，曾经的资本家。陈家住进大同坊90号是租了二房东李庄父亲的房子。这个真正的老克勒本人住在卢湾区最好的公寓陕南村，他买下90号不是居住而是投资。后来没有及时抛掉才想到要出租。他对爸爸说他能租出三楼、一楼、带二楼亭子间和三楼的阳台。二楼和三楼亭子间是不租的。他宁愿这些房子空关着，也不能租掉。所以，陈家居住得类似三

明治里的面包片。后来瑞平的爸爸才知道,石库门的二楼是一种标志,上海所有的二房东全部是住在二楼的。解放之后,已经没有了大房东,更不用说是二房东了。空房子就住进了房东的儿子李庄,后来又住进了他的太太董晴文,后来就有了他们的女儿李玮。李庄一家就成为三明治里的红肠。90号中仅仅住了六个人,加上陈家的劳动大姐只有七个人,这在拥挤不堪的最后一条小弄堂很令人惊讶。

最后一条弄堂,也就是“丰”字落底的一横,是最狭窄的,因为朝长乐路的一面,全部是店家,大房东连石库门应有的巴掌大的天井也省去了,长乐路上店面房后门朝南开着,和弄堂房的后门几乎脸贴脸,六十多户人家就这样拥挤着。瑞平小时候,经常喜欢用孩子柔软的身体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动作,其中之一就是将两脚岔开,将头从裤裆的下面倒着看世界,因为他的开裆裤在此刻张开,露出了一个白白的小屁股,所以很多的大人就嘻笑起来。他在小弄堂中这样看的时候,看到的天空是窄窄的一条,如同杭州灵隐的“一线天”。瑞平后来读了算术,知道弄堂大约仅仅三米宽。几乎伸手能够擦到对过汪蓓蓓家的窗户。因为弄堂的狭窄,就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秘密,夏天所有的窗因为暑热不得不尽数大开。如果谁家锅里的肉焦了,片刻之间,会有十多家会张皇失措地去看自己墙上的电线有没有烧着。并不是谁善于“嘁嘁喳喳”地搬弄是非,只要不是咬着耳朵说话,对面人家全能听见。而且家庭妇女有足够的聪明,在石库门弄堂中锻炼出来的察言辨色的功夫,弄堂中任何人是瞒不了什么事情的。警觉地打量着邻居,想利用别人也防备着别人,最后一条弄堂的学问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保护自己的隐私以及窥探人家的隐私。陈瑞平的妈妈是从钱塘江边上的沙地来的,她经常自暴自弃地叹息,在这里做人是一辈子学不会了。

不过妈妈还是没有放弃竞争,因为石库门女人的一生使命就是互相比赛。她们比穿着,妈妈可以将有限的布票做出全家鲜活的时装。她们比做菜,哪天一弄堂都被辣得呛咳,那是箱子店湖南新娘子赢了。如果弄堂里臭得像放毒气弹,那是绍兴老太的苋菜梗取胜。



生逢1966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广东人亭子间嫂嫂喜欢将一条蛇提在手里炫耀着进弄堂。而本地人喜欢弄堂里吃饭，即使饥饿年月，一丁点素菜，也要烧得像模像样给人看。女人什么都争，她们最后抢夺着大弄堂里可怜的阳光，弄堂就宛然是各地乡风的竞相展示，苏州人用那种平平的笕来晒酱油豆，浦东人沿着墙沿排上很多排的青菜，浙江人将一条一条的酱油肉晾在高空，安徽人将家中被虫蛀得支离破碎的灰鼠皮搭在长凳上，一铁皮箱不舍得吃的糯米绿豆出了虫，年糕发了霉，崇明人就在阳光下“消消毒”。妈妈只是扁着嘴笑了一笑，自家三楼好一片阳光！

前面说过，男人在弄堂里毫无作为，因此女人便重点培养小人。子女挺直腰板走出石库门弄堂，就是她们最大的心愿。她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不识字，但是她们会包书，她们包的书有楞有角，足够一个学期的磨损。她们每个晚上就坐在小人身边，一面补着裤子，一面看着他们做作业。后弄堂的女人对男人绝望更甚，因此这里出来的学生永远要比前弄堂的用功。有的学生起得比马桶车还要早。在黎明的时刻听到哑哑的读书声不是很意外的事情。深夜谁家的孩子在路灯下鼻子凑着书本复习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母亲眼睛向上，像擎起的酒杯望着出头之路。当一条弄堂中有很多的“用功小人”的时候，孩子们就一个盯着一个，根本不需要家庭教师。68中校长余国祯的儿子余子建住在陈家对过的亭子间里，高中的时候经常在凌晨起来读俄语。妈妈深深知道榜样的力量之无穷，有一天就把酣睡之中的瑞平摇醒。让他听着余子建翻来覆去重复艰难的大卷舌。妈妈说，共产党干部的儿子也需要天不亮读书才能到苏联留学，你就更要用功了。那时，瑞平刚刚读小学三年级。

陈瑞平的爸爸说，男人早晚要走出大同坊的，就看你是怎样走出去。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正是1966年的早春，他根本不知道1966意味着什么。

# 第 一 章

陈瑞平的爸爸和妈妈站在北窗前。吃完晚饭之后，妈妈就喊了爸爸走上三楼。他们站在窗口，立刻就把电灯关掉了。

他们就站在黑暗之中。这样，他们能看外面，外面不能看到他们。他们的眼睛张开在一片黑暗之中，等待着耳朵的提示。只有夜晚才能听到白天不能看到的事情。

“文革”时期，住在石库门的人都有一点神经过敏。弄堂里有很多这样黑暗的窗口。每一个窗口里，一对或者是几对眼睛睁开着。进入革命时期，所有的马路已经彻底红色，真正的不夜。从窗口看上去，四面天空就像是被火光映红，弄堂不免被反衬得黑漆漆的。

90号的三楼，朝北晒台已经搭建了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屋。对面是汪家，汪家也已经搭建了一间小屋，这样，两家是窗口对着窗口。爸爸是在有了瑞平之后想到要搭建晒台的，因为瑞平早晚会一个人住一间房。当然，晒台的房间比正房要马虎。比如地板，正房用的是柳桉，而晒台用的是松木。小房间刚刚造好的时候，满房间全是松木的清香，现在，地板走上去已经软软塌塌的了。

晚上10点，佣人绍兴阿姨已经睡下了。弄堂中后门大多数已经插上了。汪家四扇窗户黑黑的，汪家好婆孤身一人，想来早就睡了。

北窗的视野没有南窗开阔,不过因为弄堂的窄,比南窗要听到的多。自从“文革”以来,弄堂中没有小偷,没有要饭的。也没有穿过弄堂的叫卖声。弄堂中装在门楣上辟邪的镜子和啤酒瓶已经拿掉。放在公共走道中的东西已经自觉搬开。垃圾箱中每天都会发现宝物,有整幅的古画和珠宝,阴沟里经常会有金项链和锁片,扫垃圾的阿四大声叫喊“这是谁的东西”,弄堂里只是一片沉默。像大同坊这样的弄堂,面对这样一场红色的革命是处于很尴尬的处境的。在棚户区,革命已经成为一种节日。在高级公寓里,革命将很多的大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全部赶了出去。只有石库门弄堂,革命使他们全体很惊醒,年轻的很振奋,中年的很好奇,老年的很惊慌。

今夜,也就是1966年9月1日。弄堂难得安静。爸爸妈妈用鼻子吸着弄堂里的空气,空气没有一点异样。妈妈就打了一个呵欠,对爸爸说:“宝栋,我听对过亭子间嫂嫂说,前弄堂今天有四家被抄了,后弄堂有两家。”

“前弄堂的庄先生是一个官僚买办,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抄了。我下班的时候看见他挂着一块小黑板站在一只骨牌凳上。被单位的工人斗争。”

爸爸妈妈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有一点幸运的感觉。其实他们也是在惶惶之中生活,不过就是因为至今还没有被抄家,就很有点知足。所谓幸运都是比较出来的,幸和不幸其实在文化革命中没有一种判别的标准。他们现在很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谈论人家的悲剧。

“我们小弄堂一直很安静,一直没有人来革命。”

“厂里会不会在哪天晚上到我们家来抄一下?”

爸爸仰头想了一想,说:“不会吧,我们所有的钱财全部变成机器和厂房了,工厂在1956年就全部交给共产党了。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者了。我们和共产党是一条心的。夏副区长说过,你陈宝栋是我的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夏副区长是什么人?他是陈毅元帅带进上海的干部,是一个解放区的老同志。我从三反五反开始就是工商界的先进工作者,我们没有反动的言论。我们工厂

现在已经开始生产毛主席的像章。我们的家是不怕抄的,因为没有反动的东西可以抄出来。隔壁康绥公寓抄家的时候,我还看到那个姓张的做轮船生意的和反动市长吴国桢的合影,昨天白天我还看到了一张大字报,说是斜对面弄堂里的金先生家中有一张蒋介石骑马的像。还有今天姓庄的资本家被抄出很多的金子。我们家清清白白。再说老叶书记、工会董主席经常到我们家吃饭,他们很相信我的。我们家有什么他们还不知道?”

“不一定吧?我看这条弄堂中没有抄家的资本家只有我们一家了。如果资本家家家都被抄了,我们怎么能逃得过呢?”

“难说,吃饭时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在马路上碰到了树衡哥哥的儿子,老阿哥那么大的资本家不是还没有抄家吗?我还是要说,共产党也讲道理。”

“说不定他在今天晚上就被抄了呢?”

“不会吧。我听说工厂抄家经常是在白天,只有红卫兵抄家才在晚上。上次开会遇到夏副区长,区长还说共产党不会乱来的,文化革命也是讲政策的。毛主席不是叫你‘相信群众相信党’吗?”

“毛主席倒是有这样一条语录。不过毛主席还有另外一条语录,说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你的语录是学得比红卫兵还要好了。”

“唉。”妈妈叹了一口气,“如今他们学语录,是为了找谁可以批判;我在学语录,是看我们会不会被批判。解放这十多年,亏得你事事前进,日子过得还算是顺的。不料‘文革’说来就来了。”

“你这样就不对了,不能对革命有看法么。革命很快会过去的。过了‘文革’,我们第一要叫瑞平好好读书。等到瑞平读上了大学,娶了老婆,养了儿子。我们退休就好了,谁也不会说我们是资本家了。”

“你倒是做梦。大学已经不考了,瑞平每天在学校搞运动,你家

瑞平在学校的外号叫做‘茄克’。他们篮球队春秋天出去打球他总是穿着一件夹克衫，而这样短到腰身的茄克衫是我做的，他第一个穿的。他们都喜欢带一顶开普帽。那种开普帽就是帽檐上有一个揪钮，可以把帽子的前端变成一把铲子的那种。他们都还有一只包，是那种很时髦的马桶包。瑞平怀疑篮球队的打扮是不是也有一点阿飞？昨天瑞平回到家里，就将自己的帽子和茄克衫全部扔进了垃圾桶。还告诉我，他们班在淮海路上把两个流氓阿飞的小裤脚管剪掉了。”

在黑暗中，爸爸轻轻地笑起来：“有意思啊，资本家的儿子当了红卫兵，在扫荡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这不就是在造我的反了吗？”

妈妈也吃吃地笑着：“不过他不是红卫兵。他的袖章已经被收掉了，他是很希望参加红卫兵的，他对我说，他一定会背叛家庭的。再说，你不是一个资本家吗？你不也是在政协会议上经常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吗？”

爸爸就走回了房间，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在幽微的天光之下，爸爸妈妈在欣赏着三人的合影。爸爸在左面，很有一点志得意满，头微微仰着。妈妈在右面，好看地微笑，很幸福的样子。瑞平站在爸爸妈妈的背后，穿着夹克衫，敞开的衣领中，是一件球衣。那天，在万象照相馆，瑞平为考入高中拍报名照，摄影师就说，你们三个拍一张合影怎样？你们今天的神态都很好，拍照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神态。他们就多付了5元钱又拍了一张，当时还没有彩色照片，爸爸自己也玩照相机，有空就“揪脱两张”，他不喜欢在照片上描上很多的油彩，这张照片就是黑白的了。

“最好后面再站着一个小姑娘，有两根辫子的那种，以后还有一个小囡抱在你的手中，最好还有一个大一些的站在一边。”爸爸说的是上海传统的“全家福”。

妈妈就啐了爸爸一口。不过她看看爸爸，又说：“你倒不要说，以前对过的蓓蓓倒是很好的，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惜现在已经到新疆去了。”妈妈的手往对过划了一下。



“蓓蓓的脾气好一阵坏一阵，不要说瑞平这样老实的小人受不了，你当婆婆或许也是受不了的呢！她有时把对过汪家好婆都气得掉眼泪。”

“那时她是要到新疆去么。我家瑞平也报名的，如果批准，我也要淌眼泪水的。”

“前弄堂还有一个叫蔡小妹的，寒暑假的时候一直替她妈妈来小弄堂倒马桶的，瑞平经常说起呢。他们是一个篮球队的。”

“那个女孩辫子长长的，爹在汰衣裳做作的。我们家讨了这样的人家的媳妇，你在区政协开会的时候不要被人笑话吗？”

“笑话什么，这个女小人的功课很好的，人也很和气的。再说要人家的出身好，家里当然是没有底子的。”

“你是一厢情愿。你问过了瑞平没有？你问过了那个女生没有？你要是问了他们，他们一定是要革你命的。”

爸爸笑了起来。在一个紧张时代，这样的笑有一点故作轻松的夸张。

爸爸的笑容突然就定格了。弄堂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左右邻居的窗户中无声地探出了许多的头。对面的窗户中，汪家好婆的头也探了出来。

原来“文革”时期，晚上是没有人真正睡着的。

许多眼睛找到了一个焦点。脚步声向着这边过来了，静了片刻，听到了一些低声的核对，接下来就嘭嘭敲门。爸爸立刻把僵硬的笑容最后收敛了。他们在敲90号的门！妈妈就压低了声音问：“我们还有什么没有烧掉的吗？”

爸爸摇摇头。弄堂中已经不复寂静，前弄堂中有很多人纷纷向着后弄堂过来，脚步声很杂乱。交织着人们说话的声音。门忽然就开了，通通的楼梯声说明很多人上楼来了。接着“砰”的一声，楼下一样东西被敲碎了，余响便是一些细碎尖利的粉碎声。闹哄哄的一屋子人，指手画脚大吼。